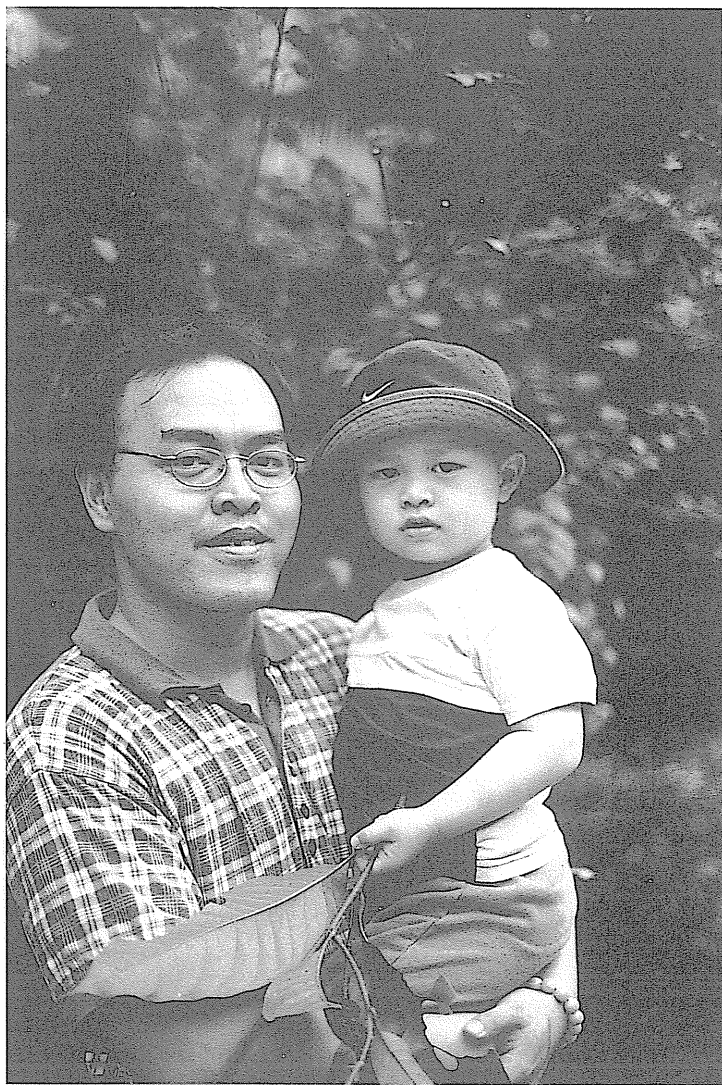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駱以軍——月球姓氏的家族刻度

二〇〇〇年，駱以軍向自己的家族史墾掘，敘述父親當年離家棄子來台的家族故事，《月球姓氏》掀起了「書獎熱」。



(陳文發攝影)

作為一個小說家，總是不斷自事實的表面底下開始挖掘，墾拓人類含藏基底的靈魂，又從靈魂向深處墾掘。作為一個小說家，似乎無可避免地成為人性的墾掘癖好者，並尋求各種題材，作為飽蘊人性的容器及外在造形。

曾被封譽為「搶搭文學大師末班車」的駱以軍，從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受張大春的啟蒙開始寫作，二十出頭就陸續得到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、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、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等國內主要幾項文學大獎，算是成名很早的作家，年紀輕輕即得到文學作家的加冕。

駱以軍從不諱言對張大春、朱天心、朱天文姊妹那一輩的作家，心中有無限地羨慕。他覺得他們的年代，正好適逢整個政治社會的解嚴時代，許多的議題，

如族群問題、女性議題等正大鳴大放，「正是將台灣小說帶入了現代小說的時代」，同時期小說的敘事風格，如魔幻寫實的敘事，也開始出現。駱以軍認為朱天心、張大春等作家可以搭上時代的列車，創作出具有「文學大師」風範的作品，而自己「只是稍稍趕上了文學大師的末班車，但卻追趕的相當辛苦」。

然而在同被稱為「新銳」的作家群中，駱以軍是備受矚目的。過去作品有：《紅字團》、《我們自夜闌的酒館離開》、《妻夢狗》、《第三個舞者》，他的每一部著作，雖然不是書市上的暢銷小說，但往往一面世即能獲得文學界與文學評論者的討論。

年輕即「出道江湖」的他，從青春書寫，荒謬突梯的現實與成長歷程交相指涉，澎湃而處處跌厥的熱情與焦慮，一直書寫到有妻有子的心境遭遇，年過卅的駱以軍，也開始溯源向家族，《月球姓氏》（聯合文學）是一部帶有溯回記憶味道的小說。像一片片段段的家族照片停格，一啟動，光和影就婆婆娑娑流動起來，將那些隱藏於瑣屑，幽微的記憶搬演、剝索，然後擺動無力停了下來。等待下一回在不知哪個瑣屑的暗示下再度啟動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日，駱以軍與相同世代、同樣都出身於文學獎的作家賴香吟，聯合舉行新書發表會。賴香吟在新書《島》的後記上寫著：「青春文學裡的主角多半不想活過卅歲，然而，轉眼之間，我們都過了卅歲」。然而駱以軍卻說：台灣的小說家若要成功，就不能在卅歲以前自殺，即使是最困頓的地方依然要繼續走

下去。

家族史寫作，前有王文興的《家變》、王安憶的《紀實與虛構》等。二〇〇〇年初，郝譽翔也出版了《逆旅》，陳文玲隨後的《多桑與紅玫瑰》。同時尚有其他作家如：張大春、鍾文音、吳淡如（《昨日歷歷，晴天悠悠》）等作家正投入家族史的寫作計劃當中。人事無常如流雲，族群雜處而時常對話齟齬的島嶼現實，如何凝聚共同的歷史意識似乎成為政客的圖騰和工具，作家們紛紛反求內化，從自己家族的歷史開始發掘，所謂的時間縱深，對人類生命的刻鑿與落痕。

駱以軍在新書發表會上說，《月球姓氏》的不同處，在嘗試玩弄更新的寫作方式。這本書的寫作方式，好像電腦程式中的檔案開啓模式，在時間的結構中，開啓一連串記憶的檔案，他說，「就像是時間被詛咒般似的斷裂，靜止在單一的時間內，於是內容的呈現也較為斷裂，其實嚴格來說，這應該不算是完整的長篇小說。」。他稱《月球姓氏》為一關於自己父親的「浪漫劇」，陳述父親的同時，也縫合的是自己、自己父親、妻子、妻子的家庭整個的家族故事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的《聯合文學》有一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研究生柯品文的評論〈那些夾雜在小說書寫中的生命議題——評駱以軍《月球姓氏》〉，一文說：「承續駱以軍早先的書寫手法中所慣用的那些荒謬曖昧的現實情境，運用那種暗藏的深邃繁複的角色情節，將之擴伸、繁衍並且歧出新意，逼視讀者注意小說虛構的本質。《月球姓氏》中更加入了故事情境中角色

與事件的游移對位。」

文中並認為，《月球姓氏》無能交代解決問題的途徑，只能「用書寫去包裹、去營造故事情境的可能。至於「答案」為何，這就由讀者自行去解決處理，或者嚴格一點說，著者彷彿有意傳達一種認知：人生所面臨到的問題，有些甚至是無法解決的，我們可做的只不過是選擇一種靜默的方式，寂靜的看著那些故事默默的發生與結束。」

《聯合報》十二月十四日〈讀書人〉專刊，則將此書定位為「新族類的記憶之旅」：「整整一代外省人老去的故事，但是，要等到父親的威權消失以後，當他們不在現場了，作為家中的男丁才驚醒覺察，再不書寫父親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所謂外省父親，是指自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台，逐漸自成一個人小傳統的族群。記者張殿將跟隨父親於孩童或青少年時期來台的第二代作家如：白先勇、王文興、劉大任，定位為外省第二代的「大哥哥」。白先勇生於一九三七年、王文興、劉大任生於一九三九年，他們的父母均是外省人，出自純粹的外省家庭。他們在六〇至八〇年代開始著手描摹父親，白先勇有《台北人》，王文興是《家變》，劉大任的則是《晚風習習》。

八〇年代後，張大春為「書寫父親這支筆交到了家門中五〇年代出生的老二」，他的江湖回憶錄《城邦暴力團》書前題辭：這個關於隱遁、逃亡、藏匿、流離的故事所題獻的幾位長者都不應被遺忘。作者認為所謂不應被遺忘的幾位長者，象徵著一個集體父親的形貌，一種廣

義的記憶。而江湖，則是正在失落的世界的倒影。

而生於六〇年代的作家，如袁哲生、駱以軍，則被認為是「這個家族中的老么」，「成為老么也是時代捉弄，他們父親的元配在大陸未到台灣，等啊等，多年過去，音訊全失不知是死是活惦記著傳宗接代而再娶，結婚的對象往往比他們年輕許多，所以這個家門中的老么比起大哥哥白先勇等差了近三十歲，比起二哥張大春也整整晚了一個世代，他們還有一位本省籍母親。」。

放在這個脈絡下觀察，駱以軍這部頻頻跳針而斷續錯落的家族史，不只是一本描摹自家瑣屑與不堪回憶的「私小說」，而有其時代的意義。

十二月是各大媒體鑑選年度好書的月份。千禧年這一年，《中央日報》首先在十二月十三日〈出版與閱讀〉版公佈年度十大好書榜，分成「中文創作類」和「翻譯類」兩類，採取複審和決審的方式，各選出十本好書，決審委員包括：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王道還、小說家平路、詩人向陽、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李爽學、台大社會系教授孫中興。《月球姓氏》列於中文創作類十大好書榜上。

繼《中央日報》年度好書榜後，當時國內最大的網路媒體《明日報》，也在十二月十八日公佈二〇〇〇年好書獎評選活動，分「十大本土書獎」、「十大翻譯書獎」和「年度最佳翻譯獎」，並同時公佈「明日報讀者票選年度好書」，《月球姓氏》得到十大本土書獎，同時入榜年度讀者票選十大好書第十名。

十二月廿五日揭曉的是聯合報〈讀書人〉版二〇〇〇年最佳書獎。有別於中央閱讀、中時開卷和明日報閱讀版等三家媒體新闢翻譯書獎，讀書人版仍按傳統分為文學和非文學兩大類及童書類推出得獎書單。文學類158種，在97位作家學者推薦票選下，《月球姓氏》進入文學類的推薦書單。

選擇在廿八日，也就是在邁入廿一世紀的倒數第三天裡公佈的《中國時報》「二〇〇〇開卷好書獎」，是國內最早舉辦的年度選書活動，有十二年歷史。二〇〇〇年十大好書分設成「中文創作」與「翻譯」兩類，「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」獲獎者也有《月球姓氏》。

在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專訪中，駱以軍提到對自己的評價，「很肯定地說，『我是一個現代主義的信仰者』；他且分析說道，如果說寫實主義關心的是人道的問題，後現代主義遊蕩於文字的符號中；則現代主義除了在作品風格的創新外，更關注到『現代社會背後的焦慮、慾望和愛』。在駱以軍的想法中，創作是一種『和巨人搏鬥』的過程。」

他的作品中，確實一貫抑底著「現代社會背後的焦慮、慾望和愛」。即使家族這源自於血緣的譜系連結，也不無與生殖或性的焦慮相關。而「我」的位置曖昧地出現，使作品呈現出多重敘事的寫作。對於這樣的寫作風格，駱以軍認為，自己的確必須在「我」和「作品」之間，強烈聯繫著，「用作品去處理自己某種現實的狀態」，同時，再從作品中，「不斷反省反轉自己在現實生活中，面對人、事、物的

態度」，這也是他選擇寫作這條路最大的動力所在。（林乃文）